

而今风浪金焦过，
犹作夫人击鼓音

梁红玉

□ 马彦如 张剑

南宋的抗金英雄中，除了有岳飞、宗泽这样的血性男儿，也有不少女英雄纵横沙场，保家卫国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在历史的画卷中，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，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，在镇江更是家喻户晓。梁红玉的丈夫韩世忠(1090年1月26日-1151年9月15日)是抗金名将，为保卫南宋立下汗马功劳。在话本故事中，梁红玉随夫出征，在阻拦十万金兵渡江一役中，亲自击鼓于镇江金山之上，为将士们助威，大破金兵。《说岳全传》中有诗赞道：“百战功名四海钦，贤哉内助智谋深。而今风浪金焦过，犹作夫人击鼓音。”

建炎三年(1129年)十一月，金军元帅完颜宗弼(即金兀术)率领号称十万的大军南侵，长驱直入，自马家渡(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)突破长江天险，攻入江浙。时韩世忠任浙西制置使，率八千水军急赴镇江，截击金军于焦山、金山之间。金兀术自与宋军交战以来，几乎没有打过败仗，根本没把韩世忠放在眼里，他狂妄地认为韩世忠是在以卵击石，于是下战书给韩世忠约期开战。此后双方在长江上展开激战，梁氏亲自擂鼓助威，士气大振，他们连续打退了金军的十几次攻击，使金军始终不能渡江，还活捉了完颜宗弼的女婿龙虎大王。

在宋军的阻击下，金军逃进了河道湮塞的黄天荡，前进无路，后退受阻，长达40日之久，嚣张气焰倍受打击。宋军战绩传遍江淮，进一步激起了江淮人民的抗金情绪。高宗六次赐札褒奖韩世忠，在战后更拜他为检校少保、神武左军都统制兼武成、感德二镇节度使。黄天荡大战，韩世忠以八千水兵大战十万金兵，彪炳史册。

在流行于镇江一带的民间故事中，梁红玉击鼓的地点，通常认为在金山妙高台上，且有“三通鼓”之说。以战鼓为号，梁红玉擂起第一通鼓，韩世忠立即指挥水军，扯帆迎敌。第二通鼓起，韩世忠指挥战船变化成“人”字队形，且战且退，隐进芦荡里。待金兀术中计追来，梁红玉擂起第三通鼓，芦荡里事先埋伏的战船冲杀出来，直将金兀术逼进黄天荡。

事实上，文学作品中的梁红玉与

历史真实人物事迹各有不同。历史上的梁红玉，史书中不见其名，只称梁氏，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也未见梁红玉这个名字，经学者们研究，梁红玉这个名字最先出现于明代张四维的《双烈记》中，书中写道：“奴家梁氏，小字红玉。父亡母在，占籍教坊，东京人也。”《说岳全传》也有“官拜五军都督府梁红玉”。在此后明清的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中开始沿用“梁红玉”这个名字，“红玉”之名以讹传讹，久而久之沿袭下来，“梁红玉”就成了历史上的梁氏。

关于梁红玉的出身，文学作品中主要的说法是，她原籍安徽池州，生于江苏淮安。梁氏的父祖都是行伍出身，她天生神力，自幼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。后来祖父与父亲都因在平定方腊之乱中贻误战机，战败获罪被杀，她也遭受牵连，沦落为京口营妓。在一次庆功宴上，她初次见到了当时还是下级军官的韩世忠，见他身材魁伟，勇猛过人，二人互生情愫，结为夫妇。

南宋罗大经的笔记小说《鹤林玉露》中《蕲王夫人》明确记载，梁红玉为“京口娼”。梁红玉33岁就去世了，死因有病死和战死两说，无从具体考证。一种说法是，1151年，韩世忠病逝。不到两年，梁氏也抑郁而终。根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九十二绍兴五年八月丁卯条记载，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，诏赐银帛五百匹两。”此外一说是，大约在绍兴五年，梁红玉随夫出镇楚州，在当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六日(1135年10月6日)，在战斗中腹部受到重伤，最后力尽而死。战后，她的遗体被敌人获得，金人感其忠勇，还将遗体送回。南宋朝廷听闻之后，对其大加吊唁。

古时江面辽阔，黄天荡为南北险渡。800多年过去了，沧海桑田，长江两岸的地理面貌发生了巨大变迁，黄天荡之名早已在地图上消失。有人认为黄天荡在镇江，应在金山附近，但当地史志没有具体的记载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黄天荡在南京地区的长江之滨，大体上在南京城东北约80里的长江南岸一带。还有一说在句容沿江。

据说镇江金山寺里至今尚存战鼓一面，可能为当年梁红玉所擂之鼓。

问道茅山三千年^{③⑥}

□ 张春蕾 夏和生

(三) 惠心白
(1879~1938年)

茅山全真派高道，闾祖派第二十二代传人。安徽人(一说山东人)，抗日战争时期为茅山乾元观监院。自幼出家，入道后刻苦学习，勤奋练功，对道教仪范极为娴熟，对道教斋醮音乐有较深造诣，武功也好，还能两手同时书写对联。

惠心白戒行极严，道德高尚，文武双全，受到乾元观道众的敬重，被推为乾元观当家。他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每日粗茶淡饭，而经常劝导道众安分守己，常存善心，并说：只有慈善的人，才能修成神仙。

陈毅率领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期间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交情甚笃。乾元观中的松风阁和宰相堂被临时当做新四军司令部和指挥部。

惠心白看到新四军纪律严明，十分敬佩，时常派徒弟下山替新四军购买药品和副食品，陈毅司令员也十分敬重惠心白的民族气节。

1938年中秋前夕，日军进犯乾元观，日军威逼拷打惠心白等道士，逼问新四军去向，惠心白和道众未吐半点军情。日军放火烧了乾元观，把惠心白道长及其他道人残酷地杀害在白虎山下。

第四章 宫观圣物

宫观是道教活动的物质载体。相比于佛教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场所，道教场所的称谓最为复杂，祠、庵、庙、治、府、洞、馆、靖庐、靖室、道院等称谓都有，当然最常见的称谓还是“宫”与“观”(guàn)。

道教场所称作“宫”与“观”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。根据《道书援神契》记载：“古者王侯之居皆曰宫，城门之两旁谓之观。”讲的是古时候帝王居处叫做“宫”，城门两旁的高楼可供眺望之处叫“观”。其实，“宫”最初就是指房子，但自秦朝后，“宫”成了帝王皇官、行宫的专称，平民百姓不能再使用。而“观”也是指皇城城门两侧的建筑物，用以登高望远，又称“阙”。所以，宫、观开始都不是用来指称道教场所的。宫、观作为道教场所庙宇的名称，经历了汉、南北朝与唐三个阶段。

相传道教中最早的“观”是尹喜在陕西建造的楼观。据《渊鉴类函》说：尹喜结草为楼，用以观星望气，物色真人，精思至道。周康王闻后，拜尹喜为大夫，故号此宅为“关令草楼

观”。尹喜是建造楼观的第一人。老子出关西行，走到此处，尹喜延请他到楼观，《道德经》就著于此。“楼观”大概是传说中道教最早的观。

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，汉武帝因听闻仙人喜欢楼居，于是诏令在长安宫城内修建蜚廉馆、桂观馆(《汉书·武帝纪》作“飞廉馆”)，在咸阳甘泉宫修建建延寿观，派臣子手持仪仗符节，广设祭具，恭候神仙驾临。这就是道教祠宇称“观”的由来。换句话说，道教袭用了汉武帝致神之所——“观”这一名称。

到东晋南朝时，天师道又多取名为“馆”，如在庐山建招真馆、南岳衡山建九真馆、桐柏山建金庭馆、茅山建长沙馆、曲林馆、建康建崇虚馆、天台山建金庭馆等。

北朝自北周武帝时改“馆”为“观”，“观”是神仙往来飞升之地，也被视为迎候天神之处。唐代沿袭北朝成规，南方和北方道教场所逐渐由“道馆”全面变为“道观”，朝廷多次敕建道观并赐题匾额。如唐高祖时改楼观为宗圣观，唐太宗时，曾敕令润州府为王远知在茅山雷平山修建太平观。

唐代统治者尊奉老子为宗祖，道教地位上升，几成国教，道教场所自然也要跟着升格。“道官”这一名称的采用是从唐玄宗开始的，道观开始全面升格为道宫。天宝元年(742年)间，改两京玄元庙为太上玄元皇帝宫。天宝二年(743年)，又将西京玄元庙改为太清宫，东京玄元庙改为太微宫，天下诸郡玄元庙则改为紫极宫。

北宋时，宋徽宗听信道士林灵素进言，自称太霄神君，诏改天下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，供奉长生大帝君、青华帝君像。从此以后，道教庙宇称作宫观，便成为普遍现象。

茅山早在公元59年，就建造了祭祀三茅君的祠庙，但那时道教尚未形成，此庙只是巫师的活动基地，并非道教场所。茅山开始建道馆，始于南北朝时。刘宋末年，长沙王在雷平山北许谧旧居旁建造长沙馆。南北朝萧齐初年，皇帝发诏书让句容人王文清在大茅山南建立道馆，号为崇元馆。

492年，陶弘景退隐茅山后，先在积金峰结庐为靖室，然后在那里择地修筑华阳馆。萧梁年间，梁武帝于天监十三年(514年)将长沙馆买下来，为陶弘景修建朱阳馆，但陶弘景在此仅住了一年，就搬到自己在大横山南、朱阳馆东建造的郁岗斋室去了。陶弘景一生的最后20年，都在郁岗斋室度过。由此可见，茅山建造道教宫观的历史至迟在南朝时期就开始了，历史相当悠久。
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

